

则是在开放主动的环境中进行的。两种“模式”不可同日而语。就中美教育关系而言，所涉及的范围更大，空间更广，因素更多。在新的起点上书写中美教育关系新的一页，容闳功不可没。

第二节 幼童留美——中美教育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1872年，饱含着容闳一生心血的留学计划开始启动，中国近代留学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30名留美幼童由陈兰彬带领，从上海出发，踏上了通向美利坚的航程。1873年6月12日，第二批30名幼童在黄胜带领下赴美，另外有7名自费生同往。1874年9月19日，第三批30名幼童由祁兆熙带领赴美。1875年10月14日，第四批30名幼童由邝其昭带领赴美。

这四批幼童中，平均年龄12岁至13岁，年龄最大的16岁，年龄最小的10岁。从地区分布来看，广东84人，占了69%；江苏21人，占了17.4%；浙江8人，占了6.6%；安徽4人，占了3.3%；福建2人，占了1.9%；山东1人，占了0.8%。^①“可见留美幼童的分布与早期中国各地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程度基本一致。”^②幼童留美计划的实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一、促成幼童留美的内外因素

（一）洋务派对容闳留学计划的支持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清政府在外交事务中经常碰到尴尬的局面，急需一批同列强打交道的外交人员。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部门，并在

^① 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的内容整理。

^② 李喜所等：《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北京开设了同文馆，在上海开设了广方言馆，在广州也设立同文馆，以学习外国语言为主，迅速培养一批外交人才，以解燃眉之急。但这些措施远远满足不了清政府外交事务的需要，同文馆学生学习的的时间太长，他们所学的知识都来自书本和课堂，与真正的外交事务的实践差距较大。因此，十分有必要派遣一批学生到国外去学习，以满足外交事务的需要。

随着曾国藩、李鸿章兴办各种工厂企业，迫切需要一批掌握外国科学技术的科技人员。他们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表示：“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善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① 洋务派人士把掌握西方技术看做其洋务工业发展的“法宝”，而要获得这个“法宝”，最佳途径就是向西方派遣留学生。这样，正好与容闳多次提出的“教育计划”不谋而合，派遣留学生的任务随即提到清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所以，“洋务运动是派遣留学生的产婆，而容闳则起着助产的作用”^②。

（二）容闳本身具备的条件是促成派遣留学生的的重要因素

留学教育计划“是予视为最大事业，亦报国之唯一政策”^③。对此，曾国藩评论说：“该员前在花旗居处甚久，而志趣深远，不为习俗所囿，同治三年曾派令出洋购买机器，该员练习外洋风土人情，美国尤熟游之地，足以联外交而窥秘匙。”^④ 容闳在美国生活多年，已把美国视为第二故乡，在美国有一大批朋友可助一臂之力，这些因素是保证容闳教育计划顺利实施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容闳代表清政府在筹划实施留美幼童的具体事宜上，展示

①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3页。

② 李喜所：《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29页。

③ 容闳著，徐凤石等译，张叔方补译，《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页。

④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7页。

了他的外交、管理才能。他把幼童留美的具体计划写信告知了耶鲁校长伯特先生 (Noah Porter): “我的政府已经最终做出决定选派一批孩子去美国接受完全的教育, 日后回到中国为政府的各个部门服务。政府最希望他们在美国学习的领域包括军事、航海、医学、法律和建筑工程, 在科学方面, 他们应该掌握化学、自然哲学、地质学、天文学。他们不许加入美国籍, 不许在美国永久居留, 也不许中途因为追求个人利益而中断学业, 他们得到政府的全额资助, 他们应该对我们的政府负有责任, 如同美国西点军校, 安那波利斯军校预备军官对政府承担的义务一样。”^① 在信中, 容闳还就幼童具体的生活和学习向波特校长求教。波特校长进行了周密的安排, 他和康州教育局局长研究决定, 为了让这批年龄幼小的中国幼童尽快学习语言, 并能得到家庭的关怀, 将幼童安排到美国人的家中。当时许多美国家庭都愿意接受这批孩子, 120 个家庭表达了意愿, 多数是教师、医生和律师家庭。美国方面的工作是有成效的, 保证了幼童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的顺利进行, 这与容闳在美国建立起的友好关系是分不开的。

(三) 美国方面的态度起了关键的作用

1872 年 2 月 5 日, 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 (F. P. Low) 告知美国总统他与李鸿章有关派遣留学生的一次会谈。“此次会谈中我得知, 派遣一批幼童前往美国接受教育的计划正在考虑之中, 数月后此计划将会最终决定, 并会将细节详细地通知我。总督说, 如果我对此项计划评价好并感兴趣, 在适当的时候把此事禀报我的政府, 他将感激不尽。同时, 如果我能在权力范围内对学生们给予安全、关心和照顾, 促使他们进入合适的学校、学院和大学, 他将非常高兴。”^② 这位外交官评价清政府的这一举措,

^① 钱钢、胡劲草:《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文汇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75 页。

^② 钱钢、胡劲草:《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文汇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72 页。



让中国的孩子在国外受教育是进步的，最有希望的征兆之一。他们认识到要与基督教国家竞争，外国知识是不可或缺的。不久，李鸿章得到了美国国务卿的答复：“毫无疑问，我国政府将会尽一切努力来促成你所期待的此项计划的开展。我非常认同阁下这项运动的发起。我相信它会给你的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并进一步增进已经存在在美国和皇家帝国之间的友谊。”^①可见，美国政府对派遣留学生赴美也是相当重视的。

(四) 幼童留美是中美外交事务推动的结果

1866年3月26日，清廷正式派出了由官员刘椿率领的第一个出国考察团，游历欧洲各国。紧随其后，1867年11月26日，清政府派志刚、孙家谷随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赴有约各国办理中外交涉事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欧美各国派遣正式外交使团，说明中国开始主动走出国门，考察和学习发达的西方文明。使团考察访问了欧美十多个国家，初步改变了对外部世界闭目塞听的状况，并且看到出国留学在欧美已成风气，中国欲图自强，当仿效各国，派遣学生出洋肄业。正如曾国藩、李鸿章所言：“于海外情形亦已窥其要领，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今中国欲仿其意而精通其法，必须“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②。中国第一次世界出访，已“导之先路”，使清政府认识到出国留洋“尚非甚难之事”。

美国人蒲安臣是清政府设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第一次向西方派遣的外交使臣。“这个奇特

^① 钱钢、胡劲草：《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② 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的安排，和‘留美幼童’的出洋有直接的联系。”^① 蒲安臣对中国充满了热情和期待。他曾说：“中国和美国地理位置相似，中国在太平洋畔，美国在大西洋边，面积、纬度相当，河网、山系类似。密西西比河恰似滚滚东去的长江；遥远的蒙古高原正如我国西北绵延的大草原。”“我们用选票选举，他们用考试选拔人才。”“我们的教育制度也有点相似，都是自愿，而非强迫。他们高度重视学校教育。推崇教师为最高的职业。”“我们有许多东西可以向他们学习，他们也可以向我们学习很多东西。”^② 作为美国这个年轻国家的代表，他没有拒绝这个当时占全世界人口 1/3 的最古老国家第一次欲求与西方各国间联系的愿望。他在担任中国第一任出使欧美各国使臣期间，所做的最重要事情，就是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条约的第四条规定：“美国人在中国，不得因美国人民异教，稍有欺侮凌虐，嗣后中国人在美国，亦不得因中国人民异教稍有屈抑苛待。”条约的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需照所有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也照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批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也可以在美国办理学堂。”^③ 这“为清政府向美国派遣幼童留学奠定了法律基础。”^④

（五）在教育方面积累的经验为留学美国做好了铺垫

进入 19 世纪 70 年代，京师同文馆已开办近 10 年，福建船政学堂也有 5 年光景，聘请外国教习在国内办理新式学堂已经积累了初步经验，派遣学生出洋留学的条件大致具备。1871 年 8

① 钱刚、胡劲草：《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文汇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9 页

② 钱刚、胡劲草：《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文汇出版社，2004 年版，第 40 页。

③ 王云五：《中外条约汇编》，商务印书馆，1933 年版，第 131 页。

④ 高宗鲁：《中国幼童留美史》，华欣文化事业出版中心，1982 年版，第 43 页。



月18日，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上奏清廷，请求派遣幼童赴美肄业，论述了国内办学与出洋留学在改革教育培养人才方面各自具有的不可取代的重大意义。^① 选募学生出洋肄业西学，培养人才，是为中国自强根本。可见，幼童留美的成行，是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下的结果。

二、留美幼童在美国

到1875年10月，120名中国幼童全部抵美，被妥善安置在美国教育发达地区的有教养的美国家庭中，开始了在美国的学习生活。

（一）留美幼童在美国的学习生活

幼童在美国受到康州人民的热情接待和支持。美国政府对幼童赴美留学表现出了相当的关心。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F. P. Low)说：“如果我们人民能够给予幼童慷慨及友善的接待，则我们在中国的利益将有更大的实惠，远比增派我们的军舰来此更佳。”^② 可见，美国方面的良苦用心。而中国方面要让这些学生牢记，“他们属于他们的祖国，而且必须属于他们的祖国；他们是为祖国才被选拔来享受这种稀世殊遇的”^③。可见，中国方面对这批幼童的希望。

学童们来到美国后，他们勤于思考，行为检点，毫无智力缺陷，并以异常惊人的速度掌握了英语。他们敢于向那一系列完全陌生的学习课程发起挑战，并表现了杰出的领悟和适应能力。在他们整个的学习过程中，无论从最基本的中小学内容，还是到大

① 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现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② 高宗鲁：《中国幼童留美史》，华欣文化事业出版中心，1982年版，第33页。

③ 容闳著，徐凤石等译，张叔方补译，《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代跋”第2页。

学的内容，也无论理科课程还是文科课程，他们在所处的班级中都名列前茅。当时幼童年龄平均不到15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和理想，这对他们终生影响至大。这些呼吸自由独立空气的幼童完全适应了美国的环境，不论境遇之顺逆，他们都能处之泰然。当时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赞这些中国幼童来自良好家庭，经历考试始获甄选。他们聪明好学，学业有成，美国学生无法相比。

耶鲁大学的菲尔浦教授（William Lyon Phelps）评价他昔日的留美的中国同学：“回想起我在哈特福德的中学时代，奇怪的发现我的记忆中最亲密的那些朋友都是那些来自中国的孩子。他们拥有迷人的东方气质，还具有天才般地接纳新事物的能力。”^①

这批幼童在学业上深受美国文化的熏陶，他们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都是系统的美国教育模式，接受当时最新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幼童们学的数学、天文、生物、化学、机械、采矿、土木工程等科目，在当时中国多是没有的。”^②他们还初步学习和掌握了一部分人文学科知识。他们把学到的知识带到实践中去，亲身观察美国社会，感受美国文化，接触美国人民，体验美国生活。他们“入乡随俗”，逐渐产生了对美国文化的认同感。从另一角度讲，他们越是感到美国国力的强大、美国文化的优越、美国教育的先进，就越感到中国的贫穷、教育的落后，反而滋长他们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情感。当清廷做出全体幼童撤回的决定时，全体幼童尽管不愿意，尽管难以割舍在美的留学生活，但他们还是回到了中国。在美国的近十年时间里，正是留美幼童生理和心理成长的关键时期，也是他们的思想从幼稚走向成熟、从朦胧走向清晰的塑

^① 高宗鲁：《中国幼童留美史》，华欣文化事业出版中心，1982年版，第107页。

^② 李喜所等：《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造定型时期。在直接学习到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的同时，确立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 中美参与留美幼童的管理

幼童留学由中美两国双重组织管理。清政府对首次派遣的留学生的管理有周密的考虑。留学章程规定：“幼童至带赴外国，悉归委员管束，分门别类，务求学术精到，又有翻译教习，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材。”^①

清政府在美国哈德福特城设立了“幼童出洋肄业局”（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作为在美的专门管理幼童的机构，该局除了负责管理幼童的各种费用开支、汉语学习，还主要监督幼童的学习。留学章程对此有明确规定：“赴洋学习幼童，入学之初，所习何书，所肆何业，应由驻洋委员列册登注，四月考验一次，年终注明等第，详载细册，责送上海道转报。”^②此外，出洋肄业局也注重从道德上管教幼童。留美幼童所在的美国康州教育局也是管理留美幼童的具体机构，负责安排幼童的寄宿、入学以及指导美国教师如何培养中国幼童等。1880年上任的吴子登还颁布了新的《规章》，对幼童们的教材、学习的科目、考核等方面作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和规定。

美国管理幼童的机构主要是康州教育局，具体解决幼童们的生活、入学指导及学习计划和安排。1872年10月，康州教育局长诺索布（B. G. Northrop）发表“致中国幼童教师”，其中要求美国教师的注意事项甚多，主要内容有：“一、凡中国学生读背书，及散息安歇，须有一定时刻，现视华生虽皆性聪品正，然在幼稚之年，当于慈爱之中，仍寓严整之意。二、华生将来学成回国，各受执掌，其余中国文字，尤需兼习勿弃，应于每日间酌

^①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版，第154页。

^②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版，第156页。

留四刻，以便专心温习汉书。先期汉教习预定三月功课，届时统由汉教习查对，庶中国文字，亦日有进益，腹简必能阔广。三、华生先须勉学忠孝，及爱戴国家，凡所肆我国之才艺，均须克尽心力。庶中国之人，感受厥益，如能循循善诱，律其念兹在兹，庶将来实效可收。四、华生尤须令之保身之道。”^① 美管理机构对幼童教师做出了多方面的要求，以保证幼童多方面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双重管理体制下中国幼童有了暂时的幸运，生活上的保障使他们可以潜心读书，政府在经济上的支持强化了他们的国家意识，他们代表国家的荣誉，他们为自己有幸成为青年一代的精英充满了自豪感。美国人民家长式的关怀使他们心理状态处于平衡，在异国他乡少了孤独和失落。中美两国双重的组织管理无论从经济上、生活上还是精神上都为幼童的异域求学提供了保障。然而，透过这种双重管理的背后，却是两种文化的冲突，清廷的目的是幼童们用在美国学习的知识，学成回国后直接为中国的发展服务；美国的目的是想利用中国幼童在美留学机会，用美国文化彻底改造中国的精英，扩大其文化的影响面。文化渗透是美国对华政策中极为重要的一环。美国想通过吸收留美学生和在中国办学堂两种方式，培养一批亲近美国的知识分子，最终实现对中国的文化征服。历史做出了最好的回答，虽然幼童在美国学习生活了长达6~10年的时间，但他们把学习与未来报效祖国联系在一起，与自己的使命联系在一起。他们用实际行动交上了合格的答卷。

中国幼童留美是中美两国之间第一次官方教育交流与合作。中美两国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双方把对幼童的管理作为教育交流中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当时中美关系尚处在良好的状态，不存在激化的矛盾。幼童留美对中国来说是“千年创始之举”，对美

^① 高宗鲁：《中国幼童留美史》，华欣文化事业出版中心，1982年版，第33~34页。



国来说则是对中国长远的文化战略的初步实施。美国兑现了条约中的承诺。

(三) 留美幼童对中国社会的回报

经过幼童的努力，他们在学业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幼童撤回中国前，他们中间近半数人顺利或提前升入大学（毕业的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两人）。^① 他们在掌握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突破了中国封建教育的局限，形成了他们的“教育救国”的理想，“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成了他们留学的理想追求。“这在 19 世纪中叶的中国看起来是一种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浪漫空想，但从历史的长远目光看却不失为一种掘艰创底的救世方策。”^②

留美幼童回国当初，虽然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们的才华在日后的工作中显露出来，逐渐得到了政府的青睐和重用。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走出国门的幼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 30 人，其中工矿负责人 9 人，工程师 6 人，铁路局长 3 人；从事教育者 5 人，其中大学校长 2 人；从事外交、行政者 24 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 12 人，外交次长、公使 2 人，外交总长 1 人，内阁总理 1 人；从事商业者 7 人；加入海军 20 人，其中海军将领 14 人。^③ 他们返回中国之时，中国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大学。留美幼童走向世界，在西方“淘金”，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群体。这个优秀的知识群体，比起国内同时期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幼童，在知识结构、综合能力等

① 钱钢、胡劲草：《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文汇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14~117 页。其中耶鲁大学 22 人、麻省理工学院 8 人、哈佛大学 2 人、哥伦比亚大学 3 人、瑞萨莱尔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5 人、阿姆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2 人、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2 人、布朗大学 1 人、斯蒂芬理工学院 1 人、里海大学 1 人、霍普金斯大学 1 人等。

② 张海林：《王韬评传附容闳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93 页。

③ 李喜所：《中国近代早期留美学生小传》，《南开史学》1984 年第 1 期。

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人物，如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之一的唐绍仪，晚清外交家、民初交通总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中国第一代矿冶专家吴仰曾等优秀人才。这就可以证明在同一时期的美国文化和教育处在世界的较高水平。

幼童留美并非失败的尝试，它是中美教育关系史上一次成功的案例。是中国向西方学习，走出国门的大胆探索。幼童留美不在于它本身的意义，而在于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了中国以外的世界，为中国进一步认识世界起了奠基性的作用，为中国以后的留学运动提供了借鉴，积累了经验，为中美教育关系的发展增添了许多内容。

三、留美幼童撤回中国

李喜所指出：“留美幼童日渐受到美国文化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就是中美文化冲突日益加剧的过程，也就是留美幼童日渐走向其留学悲剧的过程。”^① 1881年（光绪七年），中国幼童奉命辍学撤退回国，中国方面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美国方面的反应如何，其中必定有深层次的原因。

（一）留美幼童管理层的矛盾

容闳和留学监督陈兰彬等人存在尖锐的矛盾，容闳的开放思想与陈兰彬、吴子登等人的保守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陈兰彬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开眼看世界”思潮并没有激起他向西方学习的热情，他认识美国文化带有主观性，对幼童在美国的所作所为带有较强的偏见，不懂外语的尴尬往往让容闳在幼童问题上占得先机。他的下任吴子登“把中国驻

^① 李喜所等：《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洋肄业局视为是对中国文化的理论及原则的颠覆性举措”^①。他们对幼童的“美国化”十分反感，把幼童们的变化视为是西方教育对纯正的中国思想的一种“污染”，对留美幼童接受西方文化视为对中国文化的背叛。在对幼童的管理上，他们强化了封建传统的陈规旧习，强化了“种族意识”。因近代中华民族饱受欺辱的经历而染上一层民族主义色彩，蒙蔽着中国人的理性。受到美国文化熏陶的容闳与陈兰彬等人的思想存在较大的差距，借西方文化改造和富强中国的良苦用心往往被误解，他把美国学校的管理方法运用到幼童的管理中受到非难。开放与封闭，先进与落后交织在一起，这是中西文化观在教育上的反映，其结果是矛盾的激化。加之容闳加入基督教，在耶鲁大学毕业后又入美国籍，1875年又与玛莉·鲁伊莎·克洛格（Mary Louise Kellogg）结婚。这在情感上造成中国朝廷对他的不信任。陈兰彬与容闳的矛盾异常尖锐，清廷偏向陈兰彬是很自然的；少了曾国藩的支持，也使李鸿章举步维艰，无法收拾复杂的局面，这些因素成了留美幼童撤回中国的导火线。实际上，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导致了留美幼童的悲剧。

1881年，有浓厚封建意识的留美学生事务所监督陈兰彬及他的下任吴子登，不止一次地向清政府提议遣返留学生，结束留美学生事务所。他们以“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固，函应将该局裁撤”^②等为由，于1881年6月（光绪七年五月）上报“奏请撤回留美肄业学生折”，留学教育计划遭到摧残而夭折。是清廷封建官吏的世俗偏见和愚昧无知，使留美幼童的命运带上了悲剧色彩。

① 张海林：《王韬评传附容闳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

②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版，第165页。

（二）“排华”背景下留美幼童的命运

就中国政府撤回留美幼童一事，美国民间和政府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和价值取向。

许多美国友好人士对这一事件迷惑不解，他们尽全力以图挽救。他们在写给中国政府的信中表达了对这批幼童的高度评价和惋惜之情：“在异国的土地上，他们认为自己是代表他们的家庭，代表他们的伟大的中华帝国……他们已经懂得他们承担着维护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名誉的责任”。“正当他们准备从他们已为之付出的艰苦辛勤的劳动中获得丰收之时，他们却要被迫离去，我们对此深感遗憾。”^① 美国友好人士认为这一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当初是贵国政府通过美国国务卿要求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并表明所派遣的学生可以学习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礼俗、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技艺，所以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院校才接受了这些学生。迄今他们在西方制度、技艺和科学等方面还没有学到有助于中国的知识，他们的知识还不完善……而如今未经正式照会，就突然永久地撤回留学生，我们认为这与伟大的中华帝国的国体不相称，对美国也有失礼貌。”^② 然而，就美国政治层面上来说，则是另有图谋。

1871年，洛杉矶发生了“排华”暴动。1879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被海斯总统否决。1880年，卡罗拉多州丹佛市再次发生“排华”暴动，是年中美签订《北京续修条约》，明确规定美国有权限制华人入境。就在幼童撤回的第二年（1882），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美国的“排华”运动，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蔑视，是对双方签订的国际公约——《蒲安臣条约》的公然践踏。“排华”运动的冲

^① 石霓译：《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226~227页。

^② 石霓译：《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228页。



击波必然触及留美幼童。

中国派幼童留美，本在“量材拨入军政（西点军校）、船政（海军官校）两院肄业”。“当1878年（光绪四年）中国向美方提出入学申请时，遭到美方拒绝。这正是美国‘排华’运动的结果。当中国幼童在1881年（光绪七年）撤退返华时，日本已有学生毕业于美国海军官校。这对中国后来在中法、中日之战的成败，是不无影响的。”^①为以后中美教育关系埋下了阴影。正如高宗鲁指出的那样：“中国幼童首次赴美……虽然给中国‘现代化’带来起步，但总的成果是失望的……学成归国崇拜美国新生事物本属美化教育的应有成果。不幸幼童的撤回，是中美正式建交后的第一次裂痕。”^②中美教育关系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子系统，它与中美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外交关系等处在同一个系统中，必然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种影响和作用在庚款留美运动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第三节 庚款留美——中美教育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1909年，美国开始向中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帮助”中国兴办教育。这一举动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为什么在《辛丑条约》签订8年后，美国政府就做出与庚子年间索赔大相径庭的决定？“这并不是白宫的统治者热衷于传播科学文化，而是‘太平洋帝国论’的重要产物。”^③

① 高宗鲁：《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华欣文化事业出版中心，1982年版，第5页。

② 高宗鲁：《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华欣文化事业出版中心，1982年版，第6页。

③ 张静：《美国“退还”庚款和在华“兴学”论析》，《天津师大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6期。